

【读史所得】

“强项令”董宣的祠堂

——“孝堂山石祠”释读

□汪灏 海博

孝堂山石祠位于山东济南长清区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原地面房屋建筑。石祠以雕刻精湛、内容丰富、保存信息完整的汉画像享誉海内外，具有重要的历史、艺术和科学价值。孝堂山石祠主是谁，一直众说纷纭。笔者通过对石祠内有关画像的研究，认为祠主当是东汉初期著名的酷吏——“强项令”董宣。

观察祠堂内部，画像石依建筑结构分成三大主体部分：后壁和东、西两壁。一般认为，祠堂后壁的“楼阁拜谒图”表现的是“祠主”。与常见祠堂中只有一座“楼阁拜谒图”不同，此处有三座楼阁、三位受祭人。最下层一列车马出行图，中间偏左有一乘輶车，后坐一位官员，题记“二千石”。从舆服和人物所处的位置上判断，画像所反映的，正是享受“二千石”官俸的祠主本人。

“楼阁拜谒图”的上列有更大的车马队伍，左侧有一乘豪华的驷马羽盖安车，车前有“鸾雀立衡”，题记“大王车”，前人解读为“大王出行图”，反映的应该是祠主生前事奉的诸侯国君王。北壁这幅图画其实只是一个长卷画像的中间部分，它的头和尾一直延伸到东、西两壁，贯穿整个祠堂。出行队伍之庞大、场面之恢宏，在汉画像石中绝无仅有。大王车马从西向东行进，东壁的右侧，迎接大王车马的官员有上、下两人，分别题记“相”和“令”。

汉画像内容一般是以比较固定的格式化套用，祠堂内乍看人物众多，眼花缭乱，详加分析归类，其实并不复杂。如伏羲女娲、王母风伯、孔子周公、庖厨宴饮、狩猎游戏、胡汉战争等等，在汉画像石中司空见惯。显然，只有特殊的画面，才可能透露祠主信息。孝堂山石祠东壁第五区，不见于其他汉画像石，引起笔者的注意。

第五区画像也似一幅“车马出行图”。画面共有23人，从左到右，可分为两个部分。笔者发现，这幅画像所反映的内容，与东汉“强项令”董宣捉拿公主家奴的故事相似。

董宣主要活动在东汉初年，是著名的“铁面酷吏”，先后出任过北海相、怀令、江夏太守和洛阳令，所到之处，打击豪强、维护一方平安，对东汉初年治乱有突出的表现。

《后汉书·酷吏列传》记载：“后特征（董宣）为洛阳令。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，因匿主家，吏不能得。及主出行，而以奴骖乘，宣于夏门亭候之，乃驻车叩马，以刀画地，大言数主之失，叱奴下车，因格杀之。”大意是说，董宣被委任为洛阳令后不久，就遇上一件棘手的案子。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家奴“苍头”，光天化日之下杀人，然后藏匿在公主家。一天公主出行，把这个杀人的家奴也带上了，董宣就在出行的队伍必须经过的夏门亭等候。等车队到了，董宣“驻车叩马”“以刀画地”，大声宣布公主的过错，叱斥苍头下车，“因格杀之”。

再看画像故事：董宣打听到公主的车队要出城游猎，杀人的苍头就在其中。于是亲率四名弓弩手、两名健壮的狱吏和两名随从的府吏，在公主车队必须经过的路上，布下天罗地网，等候抓捕凶手。这时，他的老部下水丘岑知道了，很为他的举动担心，马上赶过来，试图阻止他的行动。董宣不听，说话间，对面车队来了。一名狱吏（也可能是“苦主”）认准了苍头就坐在仪仗队最前面的轺车中，扑上去抓住了车轮，另一名狱吏迅速抓住马缰绳，逼停了轺车，举刀呵斥苍头下车；苍头急向队伍后边的公主呼喊求救，四名弓弩手早已在车后阻断了行进的队伍，事发突然，家奴都不敢妄动；这时，走在前边的家奴发现对面洛阳令的轺车，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，跪求董宣放过；董宣毫不理睬，手中轻摇织竹圆扇，扭头观看抓捕行动……

史书记载与画像有三点出入：一是记载公主出行以苍头“骖乘”，似说乘坐同一辆车，画像上则是苍头独乘一轺车；二是记载董宣“驻车叩马”“以刀画地”，画像上的董宣却在远处观望，并没有亲自动手，这似乎更加合理；三是画像中出现了一位身佩印绶、牵住董宣车马的高级官员，史无记载，可能是董宣从前的书佐、当时的司隶校尉水丘岑。

之后即发生了“强项令”的故事：公主气恼，回宫向皇帝哭诉，说受了董宣的欺负。皇帝大怒，召董宣问罪，欲鞭杀之。董宣道：“皇上圣德中兴，而放纵家奴杀害无辜，将何以治理天下？臣不劳你鞭杀，请得自杀”，即以头撞向大殿楹柱，血流满面。皇帝令小黄门赶紧抓住他，让董宣给公主叩头赔罪了事，董宣不从，

强使顿之，董宣终不肯俯下脖子。皇帝笑道“让‘强项令’下去吧”，事后又赐钱三十万，董宣把钱全数分给了手下诸吏。此后搏击豪强，无不震栗，京师号称“卧虎”。

据《董宣传》记载，董宣在任洛阳令之前十多年间，至少还有三次在地方为官的经历。董宣是受到司徒侯霸的举荐，从幕僚小吏做起，逐步升迁至北海相——这就是在画像上题记“相”的官员。

按《郡国志》之“北海国”条，“建武十三年有菑川、高密、胶东三国，以其县属”。董宣当在建武十三年以后方到北海相任上。董宣到任后，先任用当地的豪强大族公孙丹为五官掾（相府的属吏）。公孙丹父子因杀害无辜路人，董宣处死了公孙父子。公孙宗族亲党三十多人操兵叫冤、围攻相署，董宣以公孙丹以前依附王莽，不是善类，又考虑到他的党羽众多，担心他们再次勾结海贼造反，于是痛下杀手，指使门下书佐水丘岑将他们全数捉拿杀死。青州刺史闻知，以其滥杀奏请治董宣的罪。

在青州大狱，董宣表现得毫无惧色，甚至大义凛然。就在行刑的关头，光武帝派使者持赦书到了。使者重新审讯了董宣，并如实向光武帝汇报了案情原委，于是有诏命：董宣降职使用，转任河内郡怀县令，以观后效；令青州刺史部不要再追究水丘岑的罪，另有任命——水丘岑后来做到司隶校尉（二千石），可能就是画像上试图阻止董宣的那位“佩绶牵马人”。

不久江夏郡有剧贼寇乱，光武帝想起了董宣，任命董宣为江夏太守——这就是出行图上题记“二千石”的官员。

董宣一入郡界，即发布公告：“朝廷以董某为太守，因能擒杀奸贼。今勒兵界首，诸位看到公告，要好好考虑自己的前途！”贼众闻董宣的名字已惊恐，自动归降、解散。董太守一身正气，最看不惯豪强权贵仗势作威，很快与郡都尉、外戚阴氏闹翻。董宣再次免官，在家赋闲，直到任命为洛阳令——就是在画像中题记“令”的官员。

董宣官运多舛，六十岁始升任北海相，国相和江夏太守都是二千石的高官。最后任洛阳令，虽说是京官，其实和怀县令一样，都是六百石官俸的县令，属于降级使用。董宣在洛阳令任上干了五年，74岁时卒于官。董宣死后，光武帝诏遣使者临视慰问：唯见布被覆尸，妻子对哭，有大麦数斛、敝车一乘。帝伤之，曰：“董宣廉洁，死乃知之！”以宣尝为二千石，赐艾绶，葬以大夫礼。

严耕望考证，董并也许随父亲董宣在北海国生活过几年，对山东半岛有着美好的记忆，极可能举家迁徙到出仕地。他在山东的生活和后代的情况史无记载，但其子孙在齐地或附近安居生息是极有可能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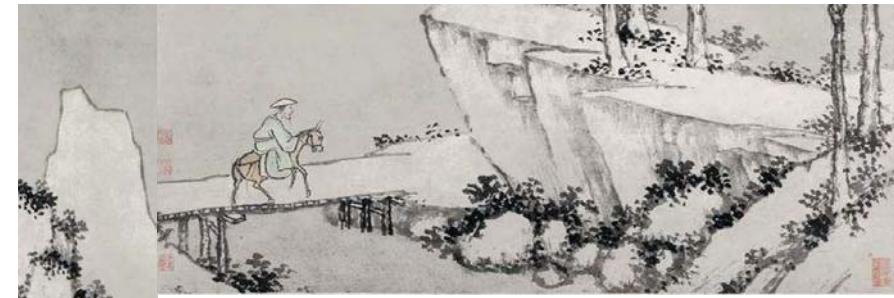
蒋英炬等认为：“孝堂山石祠的年代确定为一世纪东汉早期的章帝时期（或早至明帝）比较确切。”更准确地说，约在公元73年至83年之间。这与史书记载董并出仕齐相，和子孙定居山东的猜想，在时间上是相吻合的。此时董宣辞世已二三十年。

正如我们对朱鲔石室为何会在东缗国（今山东金乡）一样难以理解，许多断裂的历史，还有待新的发现，提供更多新的线索。目前只能猜测，因为某个未知的机缘，董并的儿孙定居到了济北国，在新开辟的家族墓地——荒芜的巫山上营造了祠堂；另外，董宣在当时美名远播，山东父老感其恩德，有自发为他立祠的愿望，这种情况在他的恩师侯霸的身后就发生过。史载，侯霸薨，“临淮吏人共为立祠，四时祭焉”。

最迟在北齐时期，孝堂山祠主就指向了孝子郭巨，传说盛行千余年不衰。如今，祠主“郭巨说”已被研究者彻底否定。那么石祠是如何附会到郭巨身上的？

汉时倡导以孝治国，“郭巨埋儿”的孝行故事在东汉广为流布，妇孺皆知，民间对郭巨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今人。干宝《搜神记》说“郭巨，隆虑人也，一云河内温人”，虽然籍贯并不十分明确，但在东汉时，这两地同属“河内郡”，河内郡的郡治在怀县，而董宣担任过“怀令”。对于后世的乡人来说，河内郭巨比“怀令”董宣的名气要大，北齐陇东王“感孝颂”即提到“前汉逸士，河内贞人”。久而久之，当地的百姓已经把董宣祠堂讹传为郭巨祠堂了。

孝堂山石祠还有许多未解之谜，尚有多幅画像难以索解。如：为什么有三座并列的楼阁和祠主？如果一位是董宣，另外两位是谁？此类问题还期待研究者的不断深入探寻。



古诗词里的桥，穿越千年的感慨

□牛艺璇

近日，国内现存最长木拱廊桥——福建万安桥突发大火，毁于一旦，令人不禁扼腕叹息。作为水路和陆路的重要交通方式，桥自从被创造以来，便一直发挥着此岸到彼岸、此山到他山的实际功效。而在情怀浪漫且富有创造力的古代文人眼中，桥却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——连接人心，沟通古今。在一个清风摇翠的夏日，笔者翻开尘封的书页，踏上了古人走过的桥。

■长安灞桥：灞桥烟柳知何限，谁念行人寄一枝

自古东出长安，过了灞桥便是中原的地界了。千百年来，经由此地的贩夫走卒、客路之人、戍边将士不计其数，在或太平或离乱的时代中不断奔走，他们在灞水波澜不惊中告别，在灞桥之上伫立回望。与此同时，深沉的离愁别绪也在酝酿，在发酵，最终从人类精神的高地喷薄而出，于是，一首首光耀千古的名篇诞生了。

据《三辅黄图》记载：“灞桥在长安东，跨水作桥。汉人送客至此桥，折柳赠别。”纵然洒脱如李白，在听闻洞箫呜咽之后，笔墨也不免感伤，于是写下了“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”的诗句。还有被后人称作“诗豪”的刘禹锡，在面对灞桥的时候，似乎也失了几分豁达之气，他笔端流淌的“征徒出灞涘，回首伤如何”，甚至比李白更哀婉伤情，远行之人不忍卒读，却已潸然泪下。

“杨柳含烟灞岸春，年年攀折为行人”。灞陵桥和灞桥柳，这两个意象共存共生，相依相偎，极大地丰富了国人表情达意的情感载体，折柳相送由此变成了诉说挽留之情和祝福之意最浪漫最诗意的方式。而灞桥也在文人的观照下，突破了物质与时空，最终演变成文学世界里一座生生不息的“情尽桥”和“断肠桥”。

■扬州二十四桥：天涯回首一销魂，二十四桥歌舞地

淮左名都是扬州，竹西佳处亦是扬州。孟浩然在烟花三月的灿烂时节，一边吟咏着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一边荡漾扁舟，顺长江而下。唐人张祜初到扬州，便已思量好了身后之事，竟发出了“人生只合扬州死，禅智山光好墓田”的感慨，着实让人凄恻动容。

二十四桥在扬州。关于二十四桥到底是一座桥还是二十四座桥的浪漫争论，至今未休。数不清的学者，道不尽的缘由，其实并不妨碍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们在此地挥毫泼墨。在扬州众多拥趸之中，翘楚者当为唐人杜牧。杜牧家世显赫，加之少年成名，故而颇好结交游宴，时常放浪形骸。某个月明星稀的夜晚，他借着几分醉意，把心绪糅进月光，写下了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。从此以后，二十四桥便走进了文学的境界，文人雅士纷纷留下墨宝，贺铸吟道，“二十四桥游冶处，留连”；王奕带着悔恨与不甘写下了相见恨晚的落寞——“二十四桥明月好，暮年方到扬州”。

遥想当年，白石老人姜夔途经扬州，看到曾经被杜牧深情以歌的好山水，如今却因连年战乱而萧条凋敝，不觉心生悲凉，化而为词，其中有言曰：“杜郎俊赏，算而今重到须惊。纵豆蔻词工，青楼梦好，难赋深情。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，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？”

■成都万里桥：雕鞍送客双流驿，银烛看花万里桥

三国时期，诸葛亮伐魏即将出使东吴的费祎，费祎感叹，“万里之行，始于此桥”，万里桥由此诞生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天府之国的富庶与周遭风物的美好，使得历代文人心向往之，故而反复吟咏玩味，作品不可尽数。

安史之乱后，诗圣杜甫拖着“百年多病”的身体，扶老携幼，一路流寓西南，至成都，便在万里桥西、浣花溪边搭建茅屋。片刻的安逸宁静，使杜甫一改“沉郁顿挫”的诗风，深情款款地写下了“万里桥西一草堂，百花潭水即沧浪”“西山白雪三城戍，南浦清江万里桥”等清新明快的诗歌。正所谓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，一生漂泊、了无所依的诗人，在山明水秀的锦官城得到了人生中屈指可数的安宁与慰藉。

唐人王建一首《寄蜀中薛涛校书》，“万里桥边女校书，琵琶花里闭门居。扫眉才子知多少，管领春风总不如”，让薛涛名噪一时，赢得了“扫眉才子”的美誉，却未曾想到，这也给她孤独终老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。深居浣花溪、手制小彩笺的薛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终是没有等来那个对她说过“别后相思隔烟水，菖蒲花发五云高”的浪荡公子元稹。万里桥终究成了薛涛生命中的伤心地和离恨天。诚如元杂剧所言：“三十三层天，离恨天最高；四百四十病，相思病最苦。”

■南京朱雀桥：我欲去寻朱雀桥，淡烟落日风萧萧

光阴流转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依然未改旧时波；风吹雨打，静默不语的朱雀桥早已洞悉世事沧桑。那些波诡云谲的风云，金戈铁马的岁月，以及悼念怀伤时的愁思，被定格在秦淮河和朱雀桥不悲不喜的时光里。

刘禹锡在历经人世波折、遭受政敌排挤的愤慨中，悲愤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句：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字里行间满含忧国忧民的大情怀、大格调。宋室南渡后，词人朱敦儒在登临凭吊时，但见“朱雀桥边晚市，石头城下新秋”，忽觉心内隐隐作痛，只一瞬便化为“昔人何在，悲凉故国，寂寞潮头”的感喟与哀思。“元曲四大家”之一的白朴，在金陵城下、朱雀桥边，忽然忆起六朝繁华旧梦，感叹道：“朱雀桥边野草，白鹭洲边江水，遗恨几时终”；清人纪昀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写下的“六朝燕子年年来，朱雀桥圮花不开。未须惆怅问王谢，刘郎一去何曾回？”更将那种“物是人非事事休”的落寞表达得淋漓尽致、哀婉久绝。

当然，曾经在文学的天空中别离过、悲戚过的桥，远远不止于此。还有在一千多年前某个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的夜晚，张继夜泊后，方才闪耀在文学国度里的枫桥。因轰轰烈烈的爱情而被人们熟知的断桥、鹊桥和蓝桥，以及晏几道笔下那座只存在于精神层面的谢桥，它们共同支撑着、扶持着，托举起了古代文学的一座又一座高峰。

就在这个烽烟散尽的夏日，我跟着古人行色匆匆的脚步，与他们一道读了桥，也读懂了桥。

编辑：徐静 美编：陈明丽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

